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3月23日

文化视野

找回我们的敬畏之心

□程冠军　程大中

何为敬畏之心？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意思是说，君子要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尊长，敬畏圣人的教导。一个人只有常怀敬畏之心，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君子三畏”主要是对道德的敬畏，这种敬畏在民间通常表现为“离地三尺有神明”的对神灵和天地的敬畏。传统社会所倡导的敬畏之心，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但在君权社会里，倒不失为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二十世纪初，随着大清帝国的终结，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被国人当作封建糟粕自己抛弃掉。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使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戕害，这场戕害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敬畏之心”几乎被破坏殆尽。改革开放以来，在金钱和利益的冲击下，人们开始出现了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很多人缺乏敬畏之心。传统的敬畏被打破，新的敬畏没有重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敬畏之心，也就没有了行为底线，一个失去了底线的人会变得异常可怕。因此，当今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西方人敬畏的是上帝和法律，中国人敬畏的是什么？

敬畏之心很重要，敬畏什么更重要；重塑我们的敬畏之心，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人们需要敬畏的首先是法律。在法律和道德的基座之上，当代中国，一个公民要有“五种敬畏”，即敬畏法律、敬畏道德、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事业。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仅有上述“五种敬畏”还不够，而是要有“七种敬畏”，即敬畏法律、敬畏道德、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人民、敬畏权力。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因此，敬畏法律当放在首位。当前，官员腐败呈高发态势，导致官员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失去监督的权力，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等等，但这些腐败官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特点——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很多贪官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之后在悔过书中说自己因为“不懂法律”才走向了贪腐之路。“不懂法律”几乎成了贪官们为自己开脱的最佳借口。这些贪官是真的不懂法律吗？非也。正常情况下，作为一名官员，其学历背景和文化程度自然要优于普通人，有的官员甚至还拥有法律专业的学习背景。因此，不是他不懂法律，而是他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违法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违法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昂。

对道德的敬畏应紧随法律之后。如果说法律是红线，道德就是黄线。康德的墓碑上刻有他的这样一段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古人所倡导的“君子三畏”大多属于道德的范畴。在现实社会里，法律和道德好比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二者共同托起社会的公平正义。一个人对于法律的敬畏主要体现的是对法的畏惧之下的尊敬；而对于道德的敬畏是一种人性的自觉。正如中国传统社会所共同追寻的“礼、义、廉、耻”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对于这些传统道德追求，我们要重塑敬畏之心。

敬畏生命是敬畏的底线。人作为万物之灵，既是万物的主宰，也与万物和谐共生，因此必须学会敬畏生命。生命不仅包括人类自身，也包括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非洲圣人”艾伯特·史怀哲说：“只有我们拥有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时，世界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它的无限生机。”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为了经济利益竟然置群众的生命于不顾，在强拆中致死人命，这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不敬。试问，有什么样的东西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呢？

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自然？因为大自然给予我们生命，并且让我们延续生命、享受美好。大自然是神奇的，她以博大的胸襟孕育了世间万物；大自然是无私的，她像母亲一样哺育万物，却从来不求回报；大自然也是脆弱的，她经不起人类对她肆无忌惮的破坏和蹂躏；大自然有时又是不可抗拒的，她一旦发怒，人类和万物在它面前又是那样渺小，如同一粒尘埃那样任凭她随意抛却。其实，古人所说的“天”就包含大自然的力量，因而“畏天命”也有敬畏自然的成分。人类依靠自然生存和发展，有时候也要同自然作斗争，但是我们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甚至为了自身的发展破坏自然。如果是那样，我们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毁灭的将是人类自己。因此，人类唯有敬畏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每当人们谈到工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敬业”。无论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有，困顿还是通达，都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思想，同时也有各自的一份职业。我们因出生和机会以及后天的努力，会走向不同的岗位。为什么有人把工作看作是做工，有人却把工作看作是事业呢？这就要看一个人对事业有没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表现出来的更像是一种热爱。我们可以把这种热爱分为三种境界：热爱你的工作，它就会成为事业；热爱你的事业，它就会成为艺术；热爱你的艺术，它就会为你带来快乐。敬畏事业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敬畏事业才能在获取个人成功的同时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是对于官员来说的，当然也包含了社会达人如企业家、社会名人等等。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是谁给你的？是人民。因此你就务必对这份权力心存敬畏，而不是滥用权力，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敬畏权力与敬畏人民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民赋予你权力，目的是让你利用好这个权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同时人民也在监督你。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的时代，一个官员和社会达人更是每天置身在社会监督下，因此更要慎其独、敬其权、畏其民。

如果说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重塑敬畏之心则是培育尊法守法、尊道贵德社会的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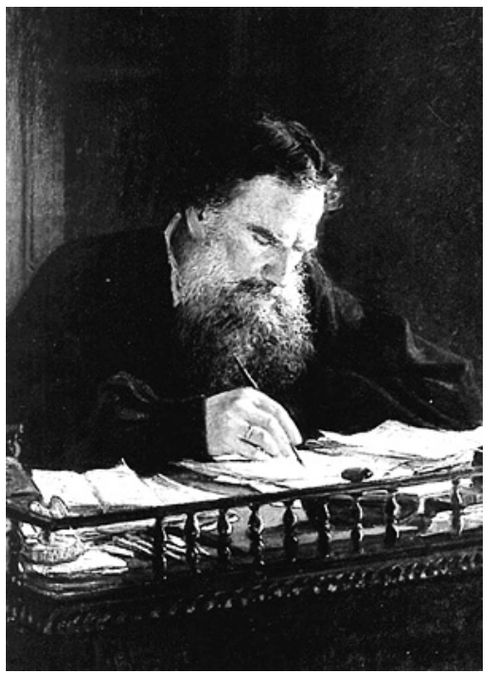
当托尔斯泰遇见老子

□杨建民

1891年10月，托尔斯泰在给出版商列杰尔列的一封信后面，附了一份“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的书目。这份书目罗列不足50部，记录了托尔斯泰自童年至63岁这个阶段阅读并留下印象的作品。《道德经》是列在印象“强烈”这个项目中的，列入此项下的作品，不过十部左右。

托尔斯泰接触老子是比较晚的，那时他已创作出《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1880年左右，托尔斯泰思想上出现了巨大困惑。1879—1882年之间，托尔斯泰写出一部表现这种困惑的长文《忏悔录》。他说：“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觉完全相同。”在这一时期，为了解决“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有愿望，为什么要做事”这个问题，托尔斯泰读了大量东西方的宗教、哲学著作，但困惑仍然纠缠着他。

一段时间，托尔斯泰开始与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信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当然，直到《忏悔录》写完几年，托尔斯泰对人生的探求仍在继续。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遇见了老子。有明确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当年3月6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我洗了澡，读老子。”

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由于这项工作，托尔斯泰甚至打算写一本介绍中国人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

就在1884年，托尔斯泰刚接触中国先哲不久，就写了一篇近乎提纲的文章《中国的贤哲》。文章分三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从有限的阅读中，托尔斯泰这样评价中华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在《中国的贤哲》中，有关“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一节，托尔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

老子对托尔斯泰的处世思想产生了影响。1884年3月10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

老子还影响到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在当年3月11日，他读了《大学》和《中庸》的英文译本，在日记中说：“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即智慧，即力量，即生命……我不知道从我的研究中会有什么成果，但是，这种研究使我做了许多善事，其标志是真诚——单一的，不是二重性的。”这样的议论，是符合老子精神内涵的。3月15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记述：“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

经过了这样较集中的阅读，托尔斯泰对孔子、老子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完全了。”他将老子及其著述与爱比克泰德、奥勒留、帕斯卡尔、佛陀这些东西方伟大思想家及著作相提并论。

这种阅读及热衷，几乎贯穿了托尔斯泰的后半生。中国的一代怪杰辜鸿铭曾与托尔斯泰通过信，托尔斯泰在信中，谈到了中国哲人的著作：“我曾竭力要知道我所懂得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宗教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并且我读过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作。”1906年，托尔斯泰写了《到底怎么办》一文。文章的前面，就引了老子《道德经》十九章里“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句。文章表达了许多与老子思想相近的观念。1909年，81岁的他又一次热衷于老子等中国先哲著作的译介出版。11月，《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俄文本出版，托尔斯泰为它写了前言《老子学说的实质》，充分表达了他对老子学说的认识：

“老子学说的基础，也就是一切伟大的、真正的宗教教义的同一个基础。它是：人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与所有别人分离的、只为自己谋幸福的有形体的个人……但是，他还意识到自己另有一个无形体的灵魂，它存在于一切生物之中，并赋予全世界以生命和幸福。”

托尔斯泰对老子的理解，应当说反映了许多欧洲人文背景的内涵：“照老子的说法，要想达到使人意识到自己是精神的和神圣的，只有一条道路，他称之谓‘道’，其中包括最高美德的概念。这种意识是依靠人人清楚的本性而获得的。所以老子的真髓也就是基督教教义的真髓。二者的实质都在于弃绝一切肉体的东西，表现那种构成人的生命基础的精神的、神圣的本源。”

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但精神的律动，却能穿透阻隔而合拍共振。托尔斯泰的晚年，灵魂处于极度焦虑之中，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和敬俭真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

文化长廊

文化新论

合力打造书香社会

□张玉胜

3月1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在回答有关“全民阅读”的问题时，李克强表示，用闲暇时间来阅读是一种享受，也是拥有财富，可以说终身受益。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无处不在。明年还会继续把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从“全民阅读”两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今年两会首提“书香社会”的概念，再到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中畅谈读书体会，并“希望全民阅读能够形成一种氛围”，凸显党和政府对全民阅读、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关注与力倡。这不仅是彰显时代文明、提升民族素质的内在要求，更是使我们每个人成为中国梦参与者和书写者的“梦之队”一员的现实需要。



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和社会进步的阶梯，阅读书籍不仅有益于人们励志、增智、养性和立德，更有助于增长素质、提高品位和改变命运。自古以来，中国就不乏“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之类的读书故事和“开卷有益”的社会共识。但曾几何时，国人这种“爱读书”的文化传统似乎已经悄然消失。一组调查数据或可佐证当下的“阅读危机”：中国每年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韩国11本，俄罗斯超过20本，以色列最多62本。

在“阅读危机”背后，有两方面认识误区：一是认为读书“没氛围”。从表面看，忙于生计和“根本停不下来”的生活快节奏，让人们没时间读书，但实质上却是全民阅读意识淡漠的表现。很多人把本来就不多的闲暇时间都奉献给打麻将、斗地主、上网聊天和刷朋友圈等娱乐性活动。二是认为“快餐式”阅读是一种必然趋势。信息科技的进步，既给国人带来了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学习便利，也诱发了一目十行、浅尝辄止的浏览式、跳跃性和碎片化的“浅阅读”习惯，这种习惯迎合了人们的功利需要，比如应付考试、捞取文凭等，由此“快餐式”阅读成为了人们的习惯，也成了青少年从小就接受的阅读模式，当习惯成自然，人们就越发认为其理所应当，殊不知快餐式阅读直接导致不善精读并产生懒于思考的思维惰性。

拯救阅读危机，打造书香社会，需营造全民阅读社会氛围。而政府引领和制度保障当为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层面。各级政府既要积极为“书香社会”建设凝聚共识、加大投入、完善设施、开展活动，更要以官员群体“读书热”的身体力行为“全民阅读”树立榜样。无论是反腐倡廉的情操陶冶还是勤政为民的本领锻造，读书都是行之有效的提升渠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

同时，要力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尽快成法。对全民阅读的氛围形成产生一定社会推动力，以法律形式界定和规范政府倡导读书的行为，更让全民阅读的资金投入、设施建设、活动实施和行为监管等有法可依。

大道为啥至简

□熊若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句名言：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使得“大道至简”成为网络搜索引擎的热词之一。“大道至简”出自《易经》：“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此为大道至简之理。”寻根问底的人们还在五代时期的著作《还金述》中找到了“妙言至径，大道至简”的出处，翻译成现代民间俚语，就叫作“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说的是，人世间最根本的道理都是能够为老百姓理解、接受和奉行的朴素真理。大道为什么至简呢？还是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两段小故事吧。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一个“三只鸭子”的经典故事。邓小平来到广东龙岭公社考察，发现一农户只养了三只鸭子，觉得很奇怪。反复追问之下，农民老大娘才告诉他，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子就是搞资本主义。邓小平问她想不想养第四只鸭子，大娘坚决摇头说自己不敢。细致的邓小平发现，院子里虽然只有三只鸭子，但准备的饲料却远远多于三只鸭子的食量。邓小平便把后院的小屋子打开了，原来里面还有二十多只鸭子，只不过鸭子嘴巴全部被绑起来了。大队干部赶紧责备大娘，大娘吓得就要把鸭子全杀了。邓小平赶紧宽慰她，说这件事情不怪她，并鼓励农民多多养鸭。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地阐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最根本、最简明的大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今天的年轻一代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人间真理；然而，将这条至简至明的道理凝聚成全党的共识，则是邓小平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如果说“三只鸭子”折射的是群众温饱线上的道理，那么“全民打车”说的则是群众小康路上的故事。在信息化时代，打车软件可以让消费者与司机直接沟通，大大减少空载率，大大减少雾霾和拥堵。这样一项连交通部长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都经常使用的创新，却遭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封杀。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建议国家对于打车软件等新生事物进行保护，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呼吁打破出租车牌照的垄断式管理，而全国工商联更是提交了正式提案，指出租车行业的种种矛盾均缘于出租车牌照的垄断经营，像出租车这样一个技术门槛低、经营水平要求不高的行业，无论如何不应该享受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其实，交通运输业应该怎么发展，出租车行业应该怎么管理，并不需要多么精深的智慧，也不需要多么繁琐的论证，看看车多的地方是怎么做的，听听人多的地方是怎么说的，那些所谓的“神马”不过都是些“浮云”而已。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再到社保养老、户籍改革，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有群众期盼的解决方案，其间都蕴含着至简至明的道理。大道至简，关键在于为政者要牢记，我们对人民的责任，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想录